

# 中法閩、臺戰事之記憶書寫： 以張景祁詩史與詞史為例\*

王曉雯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提 要

本文以中法戰爭期間閩、臺戰事為背景，探究值此內憂外患的時代，蓬勃發展的詩史與詞史，如何書寫與評價戰爭史事，為有效結合歷史背景與文學書寫的論述，擬從「文化記憶」的理論切入，同時結合「新歷史主義」的觀點，以尋求歷史場域裡屬於「詩史」與「詞史」作品更多元的詮釋空間及更豐富的內在意涵。為集中焦點以求深入解析具體作品，故擬以晚清張景祁為研究對象，以其詩詞因書寫馬尾海戰與臺灣戰場而被推為「詩史」與「詞史」，適足以為研究範式。通過本文之研究，期能為這段史事尋繹可能存在的一種自覺的文化活動，亦即通過張景祁「詩史」與「詞史」的敘述視角及歷史評價，填補並修復那些遠去的歷史場景，使消逝的事件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世人面前，並發掘深藏其中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中法戰爭 張景祁 詩史 詞史 文化記憶

---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建議，謹致謝忱。

# 中法閩、臺戰事之記憶書寫： 以張景祁詩史與詞史為例

王曉雯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一、前言

中法戰爭發生於西元 1883 年 12 月至 1885 年 4 月（即清光緒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期間，戰事係起因於法國侵略中國藩屬越南。西元 1872 年（同治十一年），法下交趾總督遣安鄴（François Garnier, 1839-1873）率海軍攻陷河內，進據北圻各地，越南政府召劉永福所部黑旗軍來援，翌年初，大敗法軍，陣斃安鄴；安鄴之死延緩了中法間的衝突，由於法國甫經普法戰爭慘敗，無力進行報復，遂以外交手腕，誘迫越南與其訂立「和平同盟條約」，越南於是淪為法國之保護國。

❶西元 1883 年 3 月（光緒九年二月），越南以國勢危急請求援助，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請赴越南招降黑旗軍將領劉永福，同年 5 月 19 日（四月十三日），黑旗軍與法軍戰於河內附近紙橋鎮，大破法軍，陣斬法將李威利（Henri Laurent Rivière, 1827-1883），12 月，法國海軍上將孤拔（A. P. Courbet, 1827-1885）統率遠東艦隊進攻駐紮於越南紅河三角洲北圻的清軍，目標直指黑旗軍的駐地山西（越南城市名），中法戰爭正式爆發。❷

---

❶ 參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76-77；歷史科教學研討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2008 年），頁 147-148。

❷ 參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2 年），頁 82。

本文以中法戰爭期間閩、臺戰事為背景，探究值此內憂外患的時代，蓬勃發展的詩史與詞史，如何書寫與評價戰爭史事，為有效結合歷史背景與文學書寫的論述，擬從「文化記憶」<sup>③</sup>的理論切入，同時結合「新歷史主義」<sup>④</sup>的觀點，以尋求歷史場域裡屬於詩史與詞史作品更多元的詮釋空間及更豐富的內在意涵。為集中焦點以求深入解析具體作品，故擬以晚清張景祁為研究對象，以其詩詞因書寫馬尾海戰與臺灣戰場而被推為「詩史」與「詞史」，適足以為研究範式。

通過本文之研究，期能為這段史事尋繹可能存在的一種自覺的文化活動，亦即通過張景祁詩史與詞史的敘述視角及歷史評價，填補並修復那些遠去的歷史場景，使消逝的事件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世人面前，並發掘深藏其中的文化意義。

## 二、閩、臺戰事背景及張景祁其人其作

中法戰爭由清、越邊界一路延伸至廣西、廣東、福建（馬尾）、臺灣（雞籠、滬尾、澎湖），最後法軍雖然佔領澎湖，但因士兵感染各種疾病，死傷慘重，甚

---

③ 「文化記憶」的概念由德國學者阿斯曼夫婦（Assmann）提出，其說有助於我們理解歷史創傷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一般而言，文化記憶涉及「人類記憶的外在維度」，它包括了「記憶文化」和「過去關涉」的概念：記憶文化指的是一個社會以文字來保存某代人的集體知識，從而確保文化連續性的記憶方式，這樣，後代人便可重構他們的文化身分；「過去關涉」則給予社會成員對歷史的意識，讓他們再次確認自己的集體身分，通過分享共有的過去，一個社會的成員便可重新確認他們的集體身分，並且獲得他們在時空中的統一性和獨有性意識。參（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收於（德）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19。

④ 「新歷史主義」的觀點，由美國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提出，依其說，歷史事件的碎片以其原始的狀態散落在時間維度上，而闡述這些歷史事件的歷史學家，為了使敘事句有條理的嵌入某一情節結構中，就必須將歷史碎片有意無意的依據結構模式的需要進行裁減或擴大。因此，歷史敘事不可能真實、完整的反映出過去的原貌，而被歷史學家「處理」過的歷史敘事和敘事結構必然會帶有歷史學家個人的意識形態，或者烙上時代色彩，沾染社會的集體無意識，最後更指出：「事實上，歷史——隨著時間而進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詩人或小說家所描寫的那樣使人理解的」。詳氏著：〈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於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78。

至連指揮官孤拔都染病身亡。<sup>⑤</sup>雖說中法戰爭所掀起的愛國詩潮並未如此前的鴉片戰爭與此後的甲午戰爭，但誠如阿英《中法戰爭文學集》所言：「晚清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諸戰役中，中國失敗得最可恥的，要推中法戰爭一役。……當時人說：『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情況正是這樣。」<sup>⑥</sup>顯然對於此場「不敗而敗」的戰事，文學書寫的角度何在，值得吾人尋繹探究。其中福建馬尾海戰在被動防守的情況之下，導致最後慘敗，可以說是中法戰爭所有戰役中，損失最嚴重的一場。<sup>⑦</sup>至於臺灣戰場，包括兩次基隆戰事與滬尾之役，過程中法軍雖佔領基隆和澎湖，但也付出慘痛的代價，而清軍於滬尾一役重擊法軍，也迫使法軍不得不離開滬尾戰場。<sup>⑧</sup>

基此，筆者期能為中法戰爭時期閩、臺之戰事，尋繹可能存在的一種自覺的文化活動，蓋學者陳平原曾於《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序文，將「記憶」區分為名詞與動詞，認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將這種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變成一種自覺的文化活動。將『記憶』從名詞轉為動詞，意味著一個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從此獲得新生。」<sup>⑨</sup>故本文擬從記憶書寫的角度切入，亦即值此衝擊，文學作品要如何涉入時局以因應世變，成為知識分子迫切的追求。所有對於史事的記憶，必定都有其殘缺之處，可能因時間流逝而斷裂或人為破壞而耗損，面對破碎的印象，文學作者以其想像力和理解力，填補並修復了那些遠去的歷史場景，同時給出帶有文化意義的歷史評價，誠如趙靜蓉研究指出：

所以可以斷言，歷史從「歷史事實」發展至「歷史話語」，或者歷史的「史實性」發展到歷史的「詩性」，其實就是歷史的原始經驗被主體主觀記憶

---

<sup>⑤</sup> 參陳悅：《中法海戰》（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年），頁309。

<sup>⑥</sup> 阿英編輯：《中法戰爭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3。

<sup>⑦</sup> 參李其霖主持：《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19年），頁22。

<sup>⑧</sup> 同前註，頁11。

<sup>⑨</sup> 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

的過程，也即歷史的記憶化。換句話說，研究歷史的記憶化，不是要研究歷史本身的發展歷程，而是要關注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作為記憶主體的個體或群體如何敘述這一段過程或者如何表達這一段過程的看法。<sup>⑩</sup>

雖然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最早論述詩、史關係時，曾特別強調「史」的現實功能和「詩」的理想功能，所謂歷史係「記述已經發生的事」，詩則「描述可能發生的事」，「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於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sup>⑪</sup>然而現當代史學家也漸趨承認「詩性思維」在歷史表現和歷史寫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歷史認識必然包括合理的邏輯推論和有限度的歷史想像，歷史同樣需要擔負尋求人類理想和實現完美價值的重任，歷史和詩係構成人類發展普遍性、必然性及可能性的共同要素。誠如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言：

雖然歷史學家堅持認為自己是在事件本身中「找到」自己的敘事模式，而不是像詩人那樣把自己的敘事模式強加在事件身上，但這種自信其實是缺乏語言自我意識，沒有認識到對事件的描寫就已經構成對事件本質的解釋。<sup>⑫</sup>

依其說，歷史學家進行歷史敘事的過程中，原始存在歷史碎片的集合並不存在這種詩性結構，而歷史學家為了使自身的敘事有意義、被理解，就不得不通過「比喻」的手法，將歷史著作中隱含的結構轉化為讀者所能接受的話語結構，故其曰：「所有的詩歌中都含有歷史的因素，每一個世界歷史敘事中也都含有詩歌的因素。我們在敘述歷史時依靠比喻的語言來界定我們敘事表達的對象，並把過去事件轉變為我們敘事的策略。」<sup>⑬</sup>就某種程度而言，歷史的「記憶化」或許可以被表述為

<sup>⑩</sup>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60。

<sup>⑪</sup>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注：《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1頁。

<sup>⑫</sup> （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於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頁174。

<sup>⑬</sup> 同前註，頁177。

歷史的「文本化」，而本文所欲探究之「詩史」與「詞史」作品，實可視為此種歷史文本化的表徵。惟考量論文篇幅，本文研究範圍必須有所匡限，依檢索結果，於中法戰爭時期可推為詞史，同時詩作亦足堪為詩史範式並錄於阿英編輯《中法戰爭文學集》選本中者，<sup>14</sup>可以張景祁為代表；且張氏於馬尾海戰與臺灣戰場，分別有詩歌及詞作歌詠之，適足援引為例分析探討。

張景祁（1830-1904），<sup>15</sup>原名左鍼，字孝成，又字孝威，一字繫甫，號韻梅，或做蘊梅，靜梅，別號新蘊主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曾任福建福安、武平等地知縣，光緒十年（1884）正月調淡水知縣，四月因病回閩就醫，疾癒返任，同年十月離臺，自新竹舊港內渡，<sup>16</sup>十二年（1886）返任淡水知縣，復於十月離任，攜家內渡。<sup>17</sup>十三年，遷連江知

<sup>14</sup> 阿英編輯：《中法戰爭文學集》，頁 19-21 及 121-122。

<sup>15</sup> 關於張景祁的生卒年，歷來說法不一。《杭州府志》、《臺北市志》等均載其生於道光七年（1827），卒年不詳。有關生年，近代學者龍沐勳《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張景祁小傳》據《新蘊詞》卷八所收〈漢宮春·六十初度自述〉詞上推，考定其生於道光七年，後世學者多採其說，如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出版社，1993年），頁 554；郭廷禮：《中國近代文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 951。但亦有持異者，如蕭亞男〈擘雅堂詩提要〉引《擘雅堂詩》卷九〈和徐毓才觀察重遊泮水詩十絕句〉之十自註：「道光甲辰祁年十五，吳夕生舫師取列錢塘邑庠。」甲辰為道光二十四年（1844），則張氏生於道光十年，此說應可確論，詳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擘雅堂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1。此外，張景祁的鄉試殊卷和拔貢卷明確標明其於道光庚寅年（1830）十一月初十日生，更可為其生年佐證資料，詳余衛星：《張景祁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月），附錄〈張景祁生卒年考〉，頁 104。有關卒年，根據《擘雅堂詩》十一卷本最後一首詩為〈病中和長媳〉，依詩句似有絕命詩之意，推知光緒二十九年（1903）除夕夜尚有詩，故張氏當卒於隔年（1904）春，年七十五，詳郭秋顯：〈錢琦、張景祁生卒年暨宦臺史事考釋〉，《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5 期（2017年12月），頁 88。（DOI：10.6517/MCUT.201712\_(5).0005）

<sup>16</sup> 張氏撰〈醉江月〉一詞題序可以為證。詳（清）張景祁：《新蘊詞》（清光緒十三年（1887）百億梅花仙館本），十卷本，卷 6，頁 12。又以下所引（清）張景祁：《新蘊詞》，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卷數及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sup>17</sup> 據《臺北縣志·行政志》第二章職官「淡水歷任知縣」載：劉勳於「光緒十年十月署」淡水知縣；汪興禕在「光緒十二年十月任」淡水知縣。詳盛清沂、金惠編纂：《臺北縣志》（新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1960年），卷 9〈行政志〉，頁 39。

縣。次歲，丁內艱去。任中節儉不苟，政尚廉平，民稱不擾。曾受業於薛時雨門下，而清末名翻譯家林紓則為其門人。工詩詞，著有《擘雅堂詩》、《新蘅詞》、《秦淮八詠》等集行世。<sup>18</sup>

《擘雅堂詩》十一卷，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杭州百億梅花仙館藏版，福州吳玉田刻本，收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全集收詩九百多首，古體詩居多，《臺北市志》稱其中「頗多歌詠臺灣之作，記述甲申中、法之戰，猶有見地，堪稱詩史云。」<sup>19</sup>《新蘅詞》有兩個版本，臺灣目前所能見者為六卷本，光緒九年開雕，杭州百億梅花仙館藏本，收在《續修四庫全書》，由上海古籍出版，此本收詞三百五十多闕，卷六泰半為在臺之作，譚獻稱曰：「笳吹頻驚，蒼涼詞史，窮發一隅，增成故實。」<sup>20</sup>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張景祁傳》更引譚氏所言稱之：「其詠臺灣及甲午戰事諸作，最為人所稱道。」<sup>21</sup>十卷本今藏上海圖書館，係光緒十三年百億梅花仙館本，收詞五百六十九闕，保留張氏詞作最完整的風貌，考量文本分析應全面檢索，故筆者親赴上海圖書館複印十卷本，以利研究材料蒐羅之全面與完整。<sup>22</sup>

<sup>18</sup> 張景祁於《清史稿》無傳，其他史傳亦罕見載述，其生平事蹟零星散見於各種詩話、地方志、書目序跋、硃卷及其自身創作中。筆者主要依《臺北市志》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兩本史料，分別為：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臺北市志》（臺北：臺北市政府，1988年），卷9〈人物志·宦績篇·張景祁傳〉，頁43；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張景祁傳》（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頁429。並參酌陳邦炎：〈笳吹鯤洋，蒼涼詞史——論新蘅詞〉，收於《詞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03-204及蘇淑芬：〈清領時期游宦人士張景祁筆下的臺灣——以張景祁臺灣詩詞為例〉，《輔仁國文學報》第29期（2009年10月），頁212-213。同時輔以郭秋顯考據之文〈錢琦、張景祁生卒年暨宦臺史事考釋〉，頁88-91，彼此相互參照，比對張景祁生平行跡，撰寫而成。

<sup>19</sup> 同前註。

<sup>20</sup> （清）譚獻：《篋中詞續二》，收於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453。

<sup>21</sup>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張景祁傳》，頁429。

<sup>22</sup> 目前臺灣學者研究張景祁詞作，因未見十卷本，部分詞作僅能轉引或發生誤引之情形，如張氏〈齊天樂·臺灣自設行省，撫藩駐臺北郡城，華夷輻湊，規制日廓，洵海外雄都也。賦詞紀盛〉一詞，時見學者誤註為六卷本，但此作僅見十卷本。詳見（清）張景祁：《新蘅詞》，卷8，頁7。

### 三、張景祁詩詞作品對馬尾海戰之記憶書寫

馬尾海戰是中法戰爭中在福建閩江發生的一場水上戰役。法國宣戰後，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率領艦隊攻擊位在福州馬尾的福建水師，福建水師未做準備，倉促應戰，主力被殲滅，法軍則一艦未沈。孤拔並摧毀馬尾造船廠、閩江沿岸砲臺等河防設施，徹底癱瘓福建沿海的海軍，順利達成法軍掌握台灣海峽制海權的戰略目標。<sup>23</sup>此場戰事，僅歷經半個鐘頭，福建水師即全軍覆沒，損失楊武號巡洋艦、福波與福星炮艇等在內的 11 艘戰艦，其中 9 艘戰艦和 19 艘帆船被擊沉，800 多名士兵死亡；<sup>24</sup>反觀法軍艦隊僅 5 人死亡，15 人受傷，軍艦傷 3 艘。<sup>25</sup>今以張氏〈偶閱黃峴孫參軍藝蘭館詩草中有甲申乙酉兩年馬江基隆紀事詩，稽覈精詳當日戰守情形，歷歷在目，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洵統兵者之龜鑑也，意有所感，追和八首〉，<sup>26</sup>組詩前四首詠馬尾海戰詩作加以分析：

#### (一)

一從互市遍閩東，海角頻吹舶趨風。破浪早憂鯨力厚，插天頓失虎門雄。  
敵情要約還修禮，廷議羈縻適啟戎。枕上行師多掣肘，疆臣何自奏膚功。

本詩首二句即點出晚清知識分子共同的憂慮，尤其自咸豐八年（1858）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外患加深，知識分子遂發古今變局之感，如江南名士馮桂芬曰：「乃

<sup>23</sup> 「馬江之役」條目，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B1%9F%E4%B9%8B%E5%BD%B9>）（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sup>24</sup> 詳安寧：〈血與火寫出了中法馬江海戰〉，《炎黃縱橫》第 8 期（2014 年），頁 23。

<sup>25</sup> 詳艾克：〈海權視角下馬江海戰致敗因素分析及其現實啟示〉，《學術界》第 10 期（2014 年），頁 45。（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4.10.004）

<sup>26</sup> 本節以下徵引組詩前四首，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學雅堂詩》，十一卷本，卷 6，頁 8。



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sup>27</sup>遁跡香港的王韜亦指出：「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海舶估艘，羽集鱗萃，歐洲諸邦幾於國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sup>28</sup>詩人承繼此種變局之感，憂心各國競逐商業利益而引發的外患侵襲，故接著以「鯨力」喻法人海艦勢力雄厚，反觀清政府自鴉片戰爭虎門一役已證實水師戰船火力不足以與西方艦隊相抗衡，而曰「頓失虎門雄」。

本詩其實要嘲諷的對象係光緒年間以張之洞、張佩綸為首的清流派，<sup>29</sup>蓋辛有政變後，慈禧太后為牽制恭親王奕訢，拉攏了清流派，借清議以維持大局，<sup>30</sup>一時「臺諫生風，爭相彈擊」。<sup>31</sup>光緒十年（1884），慈禧太后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之機發動「甲申易樞」，將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全班成員統予罷斥，逐出權力中樞，並命大臣共議中法和戰大局。<sup>32</sup>「廷議羈縻」顯言其事，諷諭「清流」誤國，正是造成馬江海戰之因，而其決策受制於慈禧太后，故曰「枕上行師多掣肘」，尤其頗受慈禧太后信賴的張之洞，更一路由翰苑諫官成了封疆大吏；甲申以後「清流」勢力幾乎全軍覆沒，適值張之洞受命督粵，其幕府遂成為「清流」人物聚焦之淵

<sup>27</sup>（清）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籌國用議》，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卷下，頁1。

<sup>28</sup>（清）王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9-80。

<sup>29</sup>有關清流派之影響，據（清）李慈銘：《越縕堂詹詹錄》（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本），卷下，頁32。「二張（張之洞、張佩綸）一李（李鴻藻）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思，廣結黨援」，由是組成一個頗具影響的政治集團。

<sup>30</sup>詳趙慧峰：〈晚清清流與同光政局〉，《烟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6年），頁41-42。

<sup>31</sup>（清）王嵩儒：《掌固零拾》，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3。

<sup>32</sup>今人陸胤研究指出：「甲申（1884）年由盛昱一疏導致『易樞』事件，圍繞主戰、主和話題，李鴻章，醇親王對朝中清議多有不滿，而張佩綸此時的辯白則更值得玩味：『言論主戰者多，轉於和局有益，願朝廷不以異議為嫌。（原注：今日又言之興獻：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一笑。）」詳氏著：〈「清流」浮沉與近代學風——以張之洞學人圈的形成為例（上）〉，《國學學刊》第3期（2012年），頁22。

藪，而此處著一「虜」字，價值判斷意味鮮明，蓋其後抗法之戰取得「鎮南關大捷」實乃馮子材及其所指揮的萃、勤二軍和潘鼎新、蘇元春指揮的二萬餘軍隊之力，非其之功也。<sup>33</sup>

(二)

漢使來乘博望槎，淋漓檄草走龍蛇。黃門抗疏擔時局，白袷談兵壓將家。  
料敵幾曾窺聚米，運籌爭欲唱量沙。征南饒有春秋癖，武庫羅胸也合誇。

本詩暗諷與寶廷、張之洞、張佩綸合稱「翰林四諫」的黃體芳，《清史稿》載其：「累遷侍讀學士，頻上書言時政得失。……皆人所難言，直聲震中外。」<sup>34</sup>故「黃門抗疏擔時局」概言其事；「白袷談兵壓將家」則謂中法戰事起，黃體芳「建所還琉球、經畫越南議。十一年，還京，劾李鴻章治兵無效，請敕曾紀澤邇歸練師，忤旨，左遷通政使。兩署左副都御史，奏言自強之本在內治，又歷陳中外交涉得失，後卒如所言。」<sup>35</sup>惟張氏此詩評黃體芳之立場，蓋承襲前首諷張之洞等朝廷「清流」人物，以其出身翰林，長於奏疏，卻在外交和軍事上既無實際經驗，也無真知灼見，故其後反用馬援與檀道濟兩名將軍的典故，「窺聚米」係指漢光武帝親征隗囂，馬援用米堆成山谷的形勢，為帝講解進軍策略一事，<sup>36</sup>此處曰「料敵幾曾」意謂「不曾」，反諷黃體芳等清流人士，一味主戰卻不解治兵之術，其運籌策略最終只如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唱量沙」<sup>37</sup>之計，只是虛有其表，以製造假象來欺瞞敵人，終非良策，故詩末用典，引黃體芳所撰〈胸有左癖賦·以武庫胸

<sup>33</sup> 詳廖宗麟：〈鎮南關大捷雜考〉，《近代史研究》第2期（1993年），頁269。

<sup>34</sup> （清）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444，頁12449-12450。

<sup>35</sup> 同前註，頁12450-12451。

<sup>36</sup> 詳（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馬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24，頁738。

<sup>37</sup> 「唱量沙」係指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伐魏，因糧食不繼而還，加上後有追兵，故軍心渙散，於是道濟乃利用夜晚，叫人以沙充糧，高聲報數，假裝存糧尚足，如此一來，軍心穩定，魏兵也不敢再追一事，詳（唐）李延壽：《南史·檀道濟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5，頁445。

中自有左癖爲韻》<sup>38</sup>暗諷其只知紙上談兵，如何以西晉征南大將軍杜預自許？曰「也合誇」是以《春秋》微言大義的筆法，一字寓褒貶，嘲諷意味鮮明。

(三)

羽扇揮軍氣象豪，兵機赤手一身操。俄驚鎖鏈連江斷，不見樓船蹴浪高。  
匿跡深山同豹隱，傷心舊部化猿號。水犀戰壘全銷歇，空費籌邊十載勞。

本詩諷刺了馬江之役指揮作戰的兩名關鍵人物——張佩綸與何如璋，兩人皆未經戎馬，雖有滿腔熱誠受命於危難之際，但限於知識和經歷，在戰術布置上措置失宜。左宗棠查奏此事，曾直言批評：

張佩綸才識夙優，勇於任事。以文學侍從之臣，初涉軍事，閱歷未深；抵閩省之日，法艦已先入口，據我腹地，未能審察形勢，將我兵輪分布要隘；明知敵人船堅炮利，乃調令兵商各艦，與敵艦聚泊一處，遂至被其轟沉，此調度之失宜也。<sup>39</sup>

首二句即描寫兩人書生儒雅，指揮若定之神態，至關「兵機」卻交付「赤手一身操」，故其後用西晉滅東吳的典故，<sup>40</sup>謂其戰略失策，不見成效，然張、何兩人甫聞炮聲，即從船政局後山潛逃，傳言是日雷雨，張佩綸跌而奔抵鼓山之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隔日奔鼓山後之彭田。<sup>41</sup>潘炳年等人更聯名上奏彈劾張佩綸，〈劾大臣玩寇疏〉曰：

<sup>38</sup> 「武庫」謂西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載：「（杜）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見俞天舒原編，潘德寶增訂：《黃體芳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458。

<sup>39</sup>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49。

<sup>40</sup> 載（唐）房玄齡等撰：《晉書·王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42，頁1207-1210。

<sup>41</sup>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頁246。

為大臣玩寇棄師，憤軍辱國，明謀罔上，怯戰潛逃，請上查辦，……臣等於馬江敗後，迭接閩信，具言張佩綸、何如璋聞警逃竄。……以張佩綸平日侈談兵事，際此中外戰局伊始，臨事自當確有把握。及閱閩信，陳其種種謬戾情形，則喪師辱國之罪，張佩綸實為魁首，而何如璋次之。<sup>42</sup>

群臣如此激憤不是沒有原因，蓋馬尾一役，導致清廷費資十餘年籌組的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陣亡官兵 800 多人，而法方僅死 5 員，傷 15 人。全詩從現實發展及戰事結果諷諭將軍無能及戰略之失策，形象頗為鮮明。

(四)

將軍繼馬鎮長門，犄角偏師護本根。差喜老羆當道臥，免教狂象出林奔。  
安危呼吸關全局，功罪分明達九閩。向使重臣齊戮力，誰聞野哭遍江村。

本詩首句「將軍」指馬江戰事鎮守長門的穆圖善，《清史稿》傳記其「出駐長門，誓師設伏，擊沉法艦一艘。既而防軍潰，法人登岸搦戰，伏起，轉敗為攻。以故閩事壞，獨免議」；<sup>43</sup>蓋馬尾海戰失敗後，穆圖善力戰堅守長門炮臺，抗擊法軍登岸入侵，時人譽為福建諸大吏中唯一「有識有勇者」，故清廷究責馬江戰事時，獨免於置議。「老羆當道」用北朝周將王羆退敵之典，<sup>44</sup>意謂穆將軍英勇退敵，免去法軍登岸之危機，故曰「免教狂象出林奔」。值得注意的是，本詩次句點出馬江戰事的失敗除了戰策錯誤，還有朝廷重臣彼此不睦，未能齊心合力，以大局為重；蓋張佩綸與何如璋於開戰前多次要求調撥南北洋和廣東水師的艦隊前來馬尾

<sup>42</sup> (清) 彭玉麟等撰：《中法戰爭資料》，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4 輯，頁 19-20。

<sup>43</sup> (清) 趙爾巽：《清史稿》，卷 454，頁 12625。

<sup>44</sup> 北朝周將王羆率人修城，到晚上仍未完成，乃將梯子留在城外，不料卻被敵人趁機偷襲。隔天清晨王羆被屋外的吵雜聲驚醒，便袒身赤腳，拿著白棒，大叫道：「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而嚇退了敵人。事見(唐)李延壽：《北史·王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 62，頁 2202。

助戰，只有廣東水師調來兩艦，南北洋師擁兵自重，對馬尾危局坐視不理，李鴻章以法艦「船堅炮巨，實非南北洋各船所能敵」，擔心「若開衅彼必在海面尋戰，倘有挫折，徒自損威，於事何濟？」得不到奧援，張佩綸僅能奏曰：「臣屢請先發，請互援，不得；勉以『藝新』、『福星』兩小船及艇船、商船雜而牽制。……臣以爲憂，密調諸將，以兵不厭詐，水戰尤爭呼吸，欲仍行先發之計。」<sup>45</sup>詩人有感於時局艱危，「安危呼吸」關乎全局，而重臣各懷偏私，未能齊心戮力，招致死傷慘重，「誰聞野哭遍江村」是對握有權柄的決策者有力的撻伐！

檢視張氏同樣詠馬江一役的「詞史」作品，有〈曲江秋·馬江秋感〉詞云：

寒潮怒激，看戰壘蕭蕭，都成沙磧。揮扇渡江，圍棋賭墅，詫綸巾標格。烽火照水驛。問誰洗、鯨波赤。指點鏖兵處，墟煙暗生，更無漁笛。○嗟惜、平臺獻策；頓銷盡、樓船畫鷁。淒然猿鶴怨，旌旗何在？血淚沾籌筆，回望一角天河，星輝高擁乘槎客。算只有鷗邊，疏葑斷蓼，向人紅泣。（卷6，頁13-14）

張氏離臺返回福建後，次年秋天親臨福建水師於馬尾全軍覆沒的鏖戰之地憑弔而作此詞，故詞中著重描寫眼前景物，並於回顧當年史事中，抒發了詞人悲憤與哀悼之情。首句「寒潮怒激」表面上寫海潮，實際上寫詞人心潮難平，原由眼前「戰壘蕭蕭，都成沙磧」敗戰荒涼之景。「揮扇渡江」用西晉名將顧榮平江東之亂的典故；<sup>46</sup>「圍棋賭墅」則化用東晉大臣謝安從容平寇的典故，<sup>47</sup>兩典皆反用，旨在呈現人物形象的從容鎮定，舉重若輕，卻不在顯其功績，故「詫」字諷刺意味濃厚，以張佩綸翩翩儒生，眾人仰其風采，<sup>48</sup>誤以爲能如諸葛亮「羽扇綸巾，談笑

<sup>45</sup>（清）羅惇齋：〈中法兵事本末〉，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輯，頁79。

<sup>46</sup>「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顧榮傳》，卷68，頁1812。

<sup>47</sup>同前註，卷79，頁2074。載前秦苻堅入寇，號稱百萬，「京師震恐」，宰相謝安卻「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

<sup>48</sup>《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載：「豐潤以欽差大臣視師福建閩縣，會辦南洋……過上海，中外人士仰望風采。既而海疆不競，豐潤主持重，為敵所乘，聞炮聲先遁，狼狽走鄉村。」轉引自尤振中、尤以丁編著：《清詞紀事會評》（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849。

間，檣櫓灰飛煙滅」，卻道是「烽火照水驛」，落了個全軍覆沒的可悲下場，故上片其後全寫悲涼場景：戰火照亮江面，將士血染江水，而當時激戰之處，如今已成餘煙廢墟，戰前江邊漁笛的悠然場景，現已蕩然無存。故下片再扣將軍戰略失策，十年來組建成軍的福建水師一夕潰敗；「頓」字形象表現其潰敗之速，只在轉瞬之間。<sup>49</sup>潰敗後，將軍遁逃，旌旗不在，唯剩沉入海底的無數官兵，化為猿鳴鶴哀，聲聲泣訴，其血淚沾滿只知紙上談兵的文人籌畫之筆。詞人回望天津，重臣如星輝閃耀，簇擁法國公使前來與清廷簽訂《中法新約》，<sup>50</sup>新約內容喪權辱國，走筆至此，詞人移情於物，以鷗邊水草如泣如訴，記憶著此段血與火的史事，沉痛之情，溢於言表。對照上引組詩其四云：「功罪分明達九閭」，可知詩人表面是說朝廷對於諸幫將領處置得當，獨穆將軍得免於置議，但實際上卻是對統治者當下未能究責「犄角偏師護本根」而不滿，所以即使功罪分明，因朝廷處置失當，自然無法驅使群臣齊心戮力，是以和、戰爭辯不休，朝廷昏庸，顯係「野哭遍江村」的根本原因。

#### 四、張景祁詩詞作品對臺灣戰場之記憶書寫

有關法軍侵臺戰事，肇始於法國冀取得基隆煤礦為戰艦提供能源，以便封鎖東南沿海，進而威脅中國沿海各大城市，也藉機佔領臺灣，增加日後談判的籌碼。清朝了解到臺灣的戰略重要，故派欽差大臣兼福建巡撫劉銘傳前來督戰。戰之初法軍擊毀沿海多處砲臺，並攻佔基隆，取得航行中國沿海所需的煤礦，隨後即封鎖全臺。然而淡水之役，清軍將領孫開華擊退法軍，令戰事陷入膠著。之後清法兩方在北部山區展開攻防戰，清軍雖敗但仍守住戰線，法軍則受制於霍亂、傷

<sup>49</sup> 據今人廖宗麟研究指出：「在不到 30 分鐘的時間裡，清政府用了十餘年時間和許多銀兩組建起來的福建水師大部分艦艇及被法艦擊沉。」詳氏著：《中法戰爭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59。

<sup>50</sup> 全稱為「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是清朝政府和法國為結束中法戰爭而於 1885 年 6 月 9 日（光緒十一年四月廿七）在天津簽訂的和約，簽字者為李鴻章和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

寒等疾病，損失慘重。最後法軍艦隊司令孤拔雖率軍攻佔澎湖，卻於 1885 年 6 月 11 日（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因疫病死於澎湖馬公，同年《中法新約》簽訂，法軍撤離，戰事結束。<sup>51</sup>今以張氏〈偶閱黃峴孫參軍藝蘭館詩草中有甲申乙酉兩年馬江基隆紀事詩，稽覈精詳當日戰守情形，歷歷在目，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洵統兵者之龜鑑也，意有所感，追和八首〉，<sup>52</sup>組詩後四首詠臺灣基隆戰事詩作加以分析：

（一）

邊釁開端始越裳，蔓延臺海益披猖。朦朧萬里輕飛渡，島嶼千門費設防。  
籌筆獨憂黃髮老，將壇重泣紫髯郎。行轅日日徵歌舞，肯信軍中氣不揚。

本詩首二句即言邊關戰事係起因於法國侵略中國藩屬越南，並一路延伸至臺灣戰場。蓋中法戰爭開打，法軍首戰告捷，法國報界紛紛「勸法廷早據海南、臺灣、舟山，為索賠東京軍餉抵押」，<sup>53</sup>故曰「朦朧萬里輕飛渡」。由於臺灣本島孤懸海中，敵艦四面可至，從理論上說，則處處可以登陸，故當時臺灣兵備道劉璈之籌防，以分派五路因地制宜的方式，分區分軍防禦，即針對此種情況而設，<sup>54</sup>「島嶼千門費設防」即謂此。其實，早在中法戰爭爆發之初，法國輿論界即有攻占臺灣之論，謂「（臺灣）土產饒富，花木秀麗，西人謂之『福爾摩沙』，譯曰美島也。現有電線一道，以達陸地；而各口商業，素稱興盛」，<sup>55</sup>然而，由於法軍受到牽制，未有足夠力量佔領整個臺灣，只能選擇具戰略意義的基隆作為突破口。基隆

<sup>51</sup> 「西仔反」條目，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B%94%E5%8F%8D>）（上網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sup>52</sup> 本節以下徵引組詩後四首，見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掣雅堂詩》，十一卷本，卷 6，頁 8-9。

<sup>53</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法軍侵臺檔》（臺北：臺灣銀行，1964 年），頁 15。

<sup>54</sup> 劉璈《巡臺退思錄·稟陳臺防利害由》：「今籌防分派五路，因地制宜。……夫權在我，則敵由我制。五路防軍，雖分猶合，運用皆可自如。」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85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頁 256-257。

<sup>55</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法軍侵臺檔》，頁 22。

戰略地位綦重，向爲兵家必爭之地，「基隆一爲所襲，媒利彼更爲擴充；洋船有恃無恐，自在游行，更不可制。況基隆地屬臺北，波浪尚平；由臺北以窺臺南，可免澎湖諸險。是基隆之關係，即全臺之關係，得失之數，所當豫籌」。<sup>56</sup> 1884年7月7日法國海軍及殖民地部長裴龍在給孤拔的命令中提及：「（基隆）對補給煤炭可能大有用處，而且對我們來說，這是個易於奪取和保有的擔保品。」後來法國總理茹費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1832-1893）於議院演說時也將「基隆及其煤礦看作最佳的擔保品，同時也一切擔保品中選擇得最爲適當、最容易保持且保持的費用也最爲低廉者」。<sup>57</sup> 五、六句用典，「籌筆」句用三國蜀漢諸葛亮典故，據《方輿勝覽》記：「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北九十九里，蜀諸葛武侯出師，嘗駐軍籌劃於此」，此外，其千古名篇〈後出師表〉亦作於此，蓋孔明晚年五次北伐中原，病歿於軍，故曰「獨憂黃髮老」；此處亦有感於晚清以降戰火連年，將軍漸老，國運令人堪憂。「將壇」句用三國東吳孫權典故，據《三國志》記載「紫髯將軍」即孫權，而「將壇重泣」則用孫權與老臣張昭事。此處用孫權典十分巧妙，其一係史書記載與臺灣關係最早者當推孫權；<sup>58</sup> 其二係上引孫權與張昭相對而泣一事，乃起因於公孫淵在遼東反魏，向孫吳稱臣以爲外應，但張昭認爲公孫淵不會守信且必敗無疑，因此反對孫吳對公孫淵的支持，但未被孫權採納，惟事後證實張昭設想爲是。<sup>59</sup> 張氏此處顯係認爲清廷應以積極備戰爲要，而非一味求和，誤判形勢。故末兩句明顯針對備戰現況表達不滿的情緒，蓋當時駐基隆守將曹志忠原屬鮑超所部霆軍，<sup>60</sup> 係晚清湘軍主力部隊之一，立下赫赫戰功，惟霆軍

<sup>56</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法軍侵臺檔》，頁 52-53。

<sup>57</sup> （法）格榮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頁 12。

<sup>58</sup> 「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吳主不聽。」見（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卷 71，頁 2259。

<sup>59</sup> 其事詳（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吳書·張昭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52，頁 1222。

<sup>60</sup> 劉銘傳六月初四（7月25日）奏摺中提及曹志忠，稱其「久著霆軍，飽經戰陣」。



組成份子複雜，士兵幾乎都是遊民、散兵游勇、地痞等，<sup>61</sup>《左宗棠全集》道：「頻年馳援江西皖南，戰功卓著，為賊所憚，兩省士民遇賊至則喜其速來，賊退則惟恐其去之不速，正以此輩善擾。」可知，民眾對「霆軍」也是頗有怨言，厭惡其軍紀敗壞。由是可知，出身霆軍的曹志忠，其領軍駐紮基隆，其軍紀管理自當為張氏所憂慮，故曰「行轅日日徵歌舞，肯信軍中氣不揚」。

除此之外，在首次基隆之役開戰之前，即發生法艦騷擾基隆情事，連橫《臺灣通史》卷十四載：

（光緒）十年春三月十八日，法艦一艘入基隆。三人上岸，登山瞭望，似繪地圖。欲入砲臺，臺官止之。既歸，以書詰基隆通判，謂臺兵無禮，當謝罪。又以商人不肯售煤，為官所禁，限至翼早七點半鐘運到艦中，否則砲擊。稅務司乃出而調停，以官煤千擔交得忌利士洋行售之，始去。墩聞報，以法人無禮，稟明南、北洋大臣詰問，蓋法人固將啟衅矣。<sup>62</sup>

當時的基隆通判梁純夫和守將曹志忠在法艦的脅迫下，一一屈從其要求，<sup>63</sup>態度未免過於軟弱，也反映了他們毫無應變能力。法方見試探目的已達到，遂於二十日啓航出口。清軍一味求和的姿態，顯係詩人用典批判的對象。

## （二）

元戎持節渡重瀛，蕃舶潛蹤躡後程。十道供張傳契箭，千村拱衛撤鄉兵。  
叩關挑戰聲先奪，開壁鑿軍計未成。六月匡王空奏績，誰封京觀殄長鯨？

<sup>61</sup>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十》曰：「霆軍之營哨弁勇，長沙省城人居多，樸者頗少，而能屢拒大敵，兵事誠不可以一律相繩乎！」李瀚章編輯：《曾文正公（國藩）全集》，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10，頁26。

<sup>62</sup>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通史社，1924年），頁465-466。

<sup>63</sup> 梁純夫查知在法艦向得忌利士洋行買煤60噸時，該洋行存煤僅有二三十噸，因不敷所求，所以回覆未賣，即向官煤廠撥煤1000擔，交得忌力士洋行轉賣給法船；曹志忠也令駐守砲臺員弁前往登船賠禮，且曉諭軍兵，免致嗣後肇生事端。

本詩首句「元戎」指劉銘傳；光緒十年閏五月十六日（7月8日），劉銘傳在天津正式啓用「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前直隸提督關防」的大印。前兩句係寫同年閏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劉銘傳在基隆港登陸上岸，第二天法艦「費勒斯」號尾隨而至一事，據1884年8月12日《申報》報導，雙方差點發生衝突：

劉省三爵帥已於閏月下，乘「海晏」輪船行抵基隆矣。是處地方文武印委各員皆出迎迓，駐防兵勇亦整隊出迎，陸中砲臺及中國兵艦皆燃炮致敬。是時外國炮船之泊於口內者只法國某兵船而已，法管駕聞炮聲隆隆，急出瞭望，瞥見兵勇蜂擁而前，不覺杯蛇市虎，自起猜疑，隨即升旗，請中國各兵艦停止燃炮，並言如越一刻猶聞炮聲，即當以炮相還等語。後經「海晏」輪船之舟師造舟求見，陳說其事，法人之疑始釋。<sup>64</sup>

可見中法兩軍已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之下，戰事一觸即發，故三四句寫基隆戰事；「十道」係行政區域之劃分，此處指銜旨督辦臺灣事務的劉銘傳，「供張」即「供帳」，乃設宴之意，全句諷刺帳中設宴之劉銘傳，自領重兵守衛基隆，卻忽傳契箭，下令基隆守衛撤兵，故曰「千村拱衛撤鄉兵」。據洪棄生《中西戰紀》載：

（法軍）至是，騷擾臺疆。兵備道劉璈守台南，頗鎮靜；提督孫開華守滬尾，劉銘傳自領重兵守基隆。……日加酉，寇一撲我軍不得入，被斬一法酋，戰士互有死傷，遂收隊。我軍方將驅之下海，戍刻遽傳劉帥令「退軍」，眾大驚；曹志忠馳問故，銘傳曰：「滬尾告急也」！志忠曰：「何不分軍往援」？曰：「亟退，毋多言」！知基隆廳梁純夫忽見大軍全撤，走伏馬首，曰：「此雖彈丸，棄之，長敵氣而喪國威，駭觀聽！且敵餒矣，將士俱不願退；奈何棄之」！銘傳不顧，以馬搗麾之去；梁純夫向基隆大哭。<sup>65</sup>

<sup>64</sup> 不著撰人：〈廈門魚箋〉，《申報》，1884年8月12日。

<sup>65</sup>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頁415。

由洪氏所記可知，劉銘傳未經與法軍力戰，便率部撤走，以致基隆輕易落入敵手，從臺灣當地公眾的情感來說，這確實是一件很難令人接受的事情，一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騷動，據《申報》報導：「至淡水內地之教堂，已為臺民所毀，臺民並以劉省三爵帥守臺不力，致被法人竄入，幾欲群起而攻之。」<sup>66</sup>更有臺北民眾聯名上書劉銘傳，稱：「愚民驚駭，私相偶語，有言棄之者，甚有言禍不深、功不烈者，嘖嘖不言。」<sup>67</sup>可見，臺灣民眾對劉銘傳「撤基援滬」的決策是極為不滿的。<sup>68</sup>於是五六兩句直言兩軍交戰，互有死傷，但守住基隆仍大有可為，劉氏卻棄基隆百姓不顧，擅自撤軍。蓋法軍此前曾於六月十五日（8月5日）砲擊基隆，隔日派遣陸戰隊登岸攻入基隆市區，途中遇總兵曹志忠埋伏，敗退回艦，「叩關挑戰聲先奪」概言其事。針對此次交戰，劉銘傳於戰報中誇稱「斬首一級，探報法兵傷亡者百餘人，遂北至船邊始返，我軍傷亡才數人。」然而根據嘎諾（Eugène Garnot）與羅亞爾（Maurice Loir）的著述是死兩人傷十人，與海軍檔案相符。<sup>69</sup>詩人除不滿劉帥撤兵之舉，亦深知其虛報戰功，故曰「空奏績」。末句問「誰封京觀殄長鯨」，延續前句，實進一步嘲諷主帥的無能，「京觀」係古代戰爭勝利者為顯示戰功，收集敵人的屍首，封土而成的高塚；「長鯨」喻指敵人，全句意謂：誰能滅敵軍封高塚？問誰人，實無人，其中除了譏諷主帥將領的無能，亦飽含對國家前途的深沉憂慮。

（三）

殺氣蕭森海國秋，呼鷹臺畔陣雲收。門旗偃日啼烏樂，堠火連天戰馬愁。

<sup>66</sup> 不著撰人：〈臺北軍電〉，《申報》，1884年10月10日。

<sup>67</sup> 臺北民眾聯名：〈臺灣道劉璈匯錄光緒十年臺北文武各員函秉〉，收於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頁569-570。

<sup>68</sup> 有關劉銘傳「撤基援滬」的決策，不少歷史學者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其決策是正確的，因為「在敵強我弱的危急關頭，正是在這一決策的指引下，（清軍）才贏得了臺灣抗法戰爭的勝利，從而導致了法國『擔保政策』的最後破產」。詳見臧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58。

<sup>69</sup> 以上詳見黃振南：〈首次基隆之役考〉，《中法戰爭諸役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80-185。

漫遣全軍援後路，忽拋孤注失前籌。翻邀節鉞巖疆寄，帳下兒曹說也羞。

本詩前四句著重戰爭肅殺殘酷的氛圍，漫無天日的戰火煙硝，感受最深切的是前線作戰的將士們。然而，原守在基隆的劉銘傳接獲電報滬尾被襲，即率營前往滬尾，僅留 300 人守獅球嶺。針對其舉，劉銘傳抗辯，以為「基隆退後，敵兵上岸駐營，兵勢已分，往攻滬尾不足千人。若不撤基隆之守，敵必全隊攻犯滬尾，無兵往援，雖提臣孫開華驍勇敢戰，器械不敵，眾寡懸殊，何能保其不失？」然而滬尾遭到敵襲，守軍孫開華抵抗不住並非真實，滬尾敵軍僅四艘軍艦，敵軍 300 多人，以當時淡水兵力並無問題。此時的劉銘傳想回防基隆已來不及，基隆陷落。<sup>70</sup>故曰「漫遣全軍援後路，忽拋孤注失前籌」。惟劉銘傳卻於清廷問責前，掠滬尾大捷之功，蓋同年八月二十日（10 月 8 日）清軍於滬尾之役大獲全勝，據洪氏《中西戰紀》載：「而適有八月二十日孫、李滬尾之捷，劉銘傳掠為棄基隆、守滬尾之功效；復介李鴻章交懽醇邸左右，得醇親王意，遂不問基隆事。」<sup>71</sup>時詩人於淡水知縣任上，親歷其事，故詩末兩句嚴詞批判劉氏，益顯深刻。

（四）

克敵端資將帥和，老臣慷慨奮天戈。出師兩表心依闕，伏枕三呼夢渡河。  
星隕南荒傾柱石，獄興北寺幻風波。烏孫躍馬終輸款，畢竟忠良翊贊多。

本詩首句即點出此役關鍵在於將帥不合，究其原由，可推晚清同治、光緒年間「湘淮不合」的派系鬥爭；以左宗棠為首的「湘軍」積極主戰，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則力保和局，兩派意見相左，在晚清政治與外交上有明顯的勢力消長。當時

<sup>70</sup> 張連忠：《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年），頁 247-281。惟近代亦有不少學者研究認為劉銘傳雖棄守基隆，但獅球嶺要衝之處仍為清軍扼守，故基隆失守，並非登陸法軍擊敗清軍的結果，而是劉銘傳移師回防的權宜之計。詳呂實強：〈綜論劉銘傳的歷史功績〉，《歷史月刊》第 96 期（1996 年 1 月），頁 30。

<sup>71</sup>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頁 416。

臺灣道劉璈，為左宗棠弟子，屬「湘軍」一員；劉銘傳奉旨督辦臺灣事務，受李鴻章力薦，屬「淮軍」之人。據李恩涵研究指出：

因為二劉都是素尚意氣、派系觀念極重的人，而又各不肯屈已從人，所以自始兩人相處即極惡劣；劉璈對北部的協餉，前後雖然支助有卅萬兩之多，但在兵力上則絕少支援。<sup>72</sup>

「克敵端資將帥和」概言此。次句「老臣」係指於滬尾一役成功擊退法軍的孫開華，「（10月）8日法軍六百名登陸，署福建陸路提督、漳州鎮總兵孫開華、提督張高元率軍迎擊，不及二十分鐘，法軍陣亡二十一名，傷四十四名，登陸之法軍倉皇退回軍艦，法軍陣亡者有海軍上尉一員，重傷者有海軍上尉一員在『勝利號』軍艦死亡」；<sup>73</sup>「慷慨奮天戈」顯其慷慨抗敵，英勇奮戰的形象，據傳當時孫將軍手刃法軍持旗兵，奪走法軍軍旗，法軍傷亡達三百多人，英國僑民曾在山上觀戰，嘆噴無己，無不頌孫開華之奮勇絕倫。三四句分別用三國諸葛亮前、後〈出師表〉及宋朝名將宗澤死前不忘北伐，三呼「過河」<sup>74</sup>的典故，彰顯是次戰役裡忠臣良將護衛臺灣的決心，同時暗諷主帥劉銘傳未能接受眾人聯名上書以及諸多守將主張克復基隆的建議。五六句則再次扣合首句二劉不合一事；蓋中法戰爭宣告結束，劉銘傳在法軍撤出基隆的四天後，立即專摺奏劾劉璈的十八罪狀，包括不聽節制、截留協餉、侵吞款項、向法國洩密資敵及任用私人等，據連橫《臺灣通史》記：「（劉銘傳）既又劾（劉）璈十八款，語多不實。奉旨革職，籍沒家產。」

<sup>72</sup> 李恩涵：〈同治、光緒年間（一八七〇—一八八五）湘、淮軍的衝突與合作〉，《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頁341。（DOI: 10.6353/BIMHAS.198007.0321）

<sup>73</sup>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326。

<sup>74</sup> （元）脫脫等撰：《宋史·宗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60，頁11284-11285。載：「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命刑部尚書錫珍、江蘇巡撫衛榮光到臺查辦。六月，奏請擬斬監候，改流黑龍江。士論冤之。將軍穆圖善聞其才，延為幕客。居數年，將為請還，而璈竟病死。」左宗棠曾挺身而出為劉璈辯護，上奏痛批劉銘傳失守基隆之罪，但遭慈禧太后原摺擲還，左氏此時已屆風燭殘年，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病逝於福州，年七十四。<sup>75</sup>詩云「星隕南荒傾柱石」即謂左宗棠逝於福州，使得朝廷痛失國之棟樑，湘軍亦失去精神領袖。而劉璈遭奏劾一事，因左宗棠已無力相助，其事經刑部尚書錫珍與江蘇巡撫衛榮光的查辦，證實十八款罪狀中，僅第七款和第十四款可以成立，確有納賄貪汙之情事，但衛榮光對劉璈的公正判詞清廷並未接受，而判劉璈斬監候，後因劉璈曾任浙江臺州府，有政聲，該地紳民為他交清應償公款，始罪減一等，發配黑龍江。<sup>76</sup>詩云「獄興北寺幻風波」蓋言其事，詩中著一「幻」字，有虛空之意，與連橫所論「語多不實」、「士論冤之」相同，皆意在批評劉銘傳因派系鬥爭、個人恩怨，而羅織罪名置劉璈於死地，詩人於此顯然有意為劉璈平反，同時再次譏刺了當初退守基隆的劉銘傳。全詩至此，寫基隆一役的褒貶定見相當鮮明，而再回到臺灣戰場，因滬尾大捷最終取得勝利，因此詩末兩句傳遞正向且積極的意涵，「烏孫」係西漢時由烏孫在西域建立的游牧民族國家，曾是西域最強大的國家，後與西漢建交，故曰「烏孫躍馬終輸款」，蓋因歷代皆有忠臣良將翊贊輔佐，國家命運、朝廷未來最終值得期待。

檢視張氏同樣詠臺灣基隆戰事的「詞史」作品，有〈望海潮·基隆為全臺鎖鑰，春初，海警狎至上游，撥重兵堵守，突有法蘭兵輪一艘，入口游奕傳是越南奔北之師，意存窺伺，越三日，始揚帆去，我軍亦不之詰也〉詞云：

插天翠壁，排山雪浪，雄關險扼東溟。沙嶼布棊，颿輪測線，龍驤萬斛難經。笳鼓正連營。聽回潮夜半，添助軍聲。尚有樓船，鸞帆影裏轟危旌。○  
追思燕領勳名。問誰投健筆，更請長纓。警鶴唳空，狂魚舞月，邊愁暗入

<sup>75</sup> 詳參李恩涵：〈左宗棠與清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頁228-229。

<sup>76</sup> 同前註，頁230。

春城。玉帳坐談兵。有獐花壓酒，引劍風生。甚日炎洲洗甲，滄海濁波傾。  
(卷6，頁3)

此詞上片描繪基隆地理形勢與守備，下片則表達對軍情的憂慮及對守軍將領不滿的情緒。開頭六句極力渲染基隆地理形勢之險要；首二句寫基隆山勢險峻、海浪洶湧，形象鮮明，第三句除了再次強調其地理環境之「險」，更強調其所處位置至關重要，扣合序文所言「基隆為全臺鎖鑰」，<sup>77</sup>其後三句寫基隆附近海域，有社寮島和桶盤嶼等小島，周圍水域或深或淺、明礁暗沙散布其中，需有船隻仔細探測水道，方可航行，<sup>78</sup>既有如此顯要可據，故曰「龍驤萬斛難經」，意謂敵人縱有萬斛巨輪，亦難從關前經過。形勢寫畢，詞人進而寫軍備，「笳鼓正連營。聽回潮夜半，添助軍聲」，連營的笳鼓之音激越悲涼，彷彿壯士慷慨高歌，伴隨大海濤聲，添助軍聲，更使人有驚心動魄之感。「尚有樓船，鸞帆影裏矗危旌」則以危旌高懸，獵獵隨風，彰顯軍容之盛，同時呼應詞序「撥重兵堵守」之句。由是，基隆既據形勢之險，又具軍備之強，易守難攻，敵人斷難入侵，惟序文明言法軍孤艦而入，意圖窺伺，守軍將領卻任其達三日之久而不詰，足見其失職至此，故下片針對守軍將領失職予以抨擊。

下片三句分別用東漢班超及西漢終軍典故，據《後漢書·班超傳》載班超面相：「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且因其家貧，常為公家抄書以自供養，曾投筆於地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來他抗擊匈奴，「立功西域，封定遠侯」，<sup>79</sup>「追思燕頤勳名。問誰投健筆」兩句用其事；「更請長纓」用西漢終軍事，據《漢書·終軍傳》載終軍出使南越時，曾對漢武帝表示「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sup>80</sup>詞人曰「問誰投健筆，更請長纓」正是慨歎今日無人肯投筆從戎、萬

<sup>77</sup> 康熙末年參與撰修《諸羅縣志》的陳夢林著文指出：「雞籠為全臺北門之鎖匙。」

<sup>78</sup> (法)格榮特著，黎烈文譯之《法軍侵臺始末》，詳記基隆地理形勢。

<sup>79</sup>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47，頁1571。

<sup>80</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64，頁2821。

里請纓，共同抵禦異國的入侵，而「追思」抗擊匈奴、立功西域的班超「勳名」其實是對守軍將領一味求和、怯懦無能的嚴厲指責。尤其面對今日局面實是「警鶴唳空，狂魚舞月」，敵人來勢洶洶，十分猖獗，但手握重兵的將領卻是「玉帳坐談兵。有獐花壓酒，引劍風生」，於帳幕中飲酒歡宴、高談闊論，談兵舞劍之姿固似英雄，對登門挑釁的敵人竟「不之詰」，則邊防將如何？詞人思慮及此，不禁慨然曰「甚日炎洲洗甲，滄海濁波傾」；「炎洲」指臺灣，詞人企盼守軍將領能積極備戰、驅逐夷虜，待挽滄海之波後方能洗甲談兵，共慶太平之日。

光緒十年（1884）八月十三日，法軍艦隊攻佔基隆，「十五日，孤拔布告封港，北至蘇澳，南至鵝鑾鼻，凡三百三十九海里，禁出入。分駐兵船巡緝，以蘇澳至基隆八艘，淡水至安平三艘，打鼓至恆春二艘。航行之船須距岸五海里外，否則擊之。」<sup>31</sup>同年十月張氏作〈酌江月·法夷既據基隆，擅設海禁。初冬，余自新竹舊港內渡，遇敵艘巡邏者駛及之，幾為所困。暴風陡作，去帆如馬，始免於難。中夜抵福清之觀音澳止，宿茅舍，感賦〉依詞序可知，詞人欲從海上潛回大陸，途中遇法艦巡邏，幸遇暴風忽起得脫，遂作詞紀之：

樓船望斷，歎浮天萬里，盡成鯨窟。最有仙槎凌浩渺，遙指神山弭節。瓊島生塵，珠崖割土，此恨何時雪？龍愁鼉憤，夜潮猶助嗚咽。○回憶鳴鏑飛空，森輪逐浪，脫險真奇絕。十幅布帆無恙在，把酒狂呼明月。海鳥忘機，溪雲共宿，時事今休說。驚沙如雨，任他窗紙敲裂。（卷6，頁12）

上片首三句寫海疆局勢；詞人登船遠眺，大海茫茫，隨處遊弋著敵艦，入目驚心。「浮天」指大海，「鯨」喻敵人軍艦；曰「萬里」，曰「盡」，則意謂敵軍所佔領地已遍及萬里海疆，國勢危急不難想見，詞人長歎由此而來，意即張氏長歎不僅為臺灣而發，而是包含著對鴉片戰爭以來東南沿海地區飽受侵略與攻擊的憤怒和屈辱，有著十分深刻的歷史內涵。接著，「別有仙槎」二句敘自己自臺內渡；「仙槎」指自己所乘之船，「神山」喻神州大陸。在這長鯨鼓鬣奮鬣的萬里風濤

<sup>31</sup> 連橫：《臺灣通史》，頁468。



中，詞人不畏路途險惡，毅然乘船內渡，蓋因思及家國土地遭無情蹂躪，內心怨恨與憤怒便難以消些，故曰「瓊島生塵，珠崖割土，此恨何時雪？」短短三句，將詞人悲痛激切之情和盤托出，寫來擲地有聲！下片以「回憶」形式倒敘途中遇險。在「鳴鏑飛空」的槍林彈雨排空而來之際，所乘之船竟能借風推浪疾馳逃脫，果如神助。「把酒狂呼」既是脫離險境之後的慶幸，也是滿腔憤怒的傾瀉，故詞末五句「海鳥忘機」云云，看似解脫，實則悲憤之情的深化，尤其「時事今休說」五字可謂沉痛之極的心聲。全詞與序文兩相參照，記錄了當年法軍不僅侵佔基隆，並於各地領海上橫行的史實，同時，詞人以反說的方式來批評時政，抒發感慨，使其對當局者的批判顯得既含蓄又激烈，也將憂時愛國之情表達得既宛轉又深刻。

又〈秋霽·基隆秋感〉詞云：

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煙銷，大旗雲掩，燕巢自驚危暮。  
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遙望故壘，  
毳帳凌霜，月華當天，空想橫槊。卷西風、寒鴉陣黑，青林凋盡怎棲托。  
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暮山銜照，數聲哀角。

（卷6，頁14）

張氏作此詞時，法軍艦隊砲轟馬尾船廠，全殲清廷福建水師，繼又大舉進據臺灣基隆，在此之前，詞人有〈望海潮〉一詞，雖已心懷隱憂，但仍自豪基隆「雄關險扼東溟」、「龍驤萬斛難經」，而如今「全臺鎖鑰」之地卻已陷落敵手，則全詞充滿沉痛悲愴的基調。

開篇三句以寶島蒙塵的事實引發詞人對國難的哀傷；「痛」字除了傳達對法軍侵略之痛恨，亦飽含對國土淪陷的悲憤及守將無能的痛心，寓意豐富深沉。「鎖甲」三句形象描繪基隆一役的慘烈情景，寫基隆失守，武備損失慘重。值得注意的是，「自驚」一詞，參照前引組詩，應旨在暗諷劉銘傳本應指揮作戰，堅守陣地，卻反而猶如築巢於飛幕之燕子，驚恐不已，兀自從基隆撤兵。故下句「乍聞鶴唳」係用前秦苻堅在淝水被晉謝玄打敗，棄甲遁逃，聞風聲鶴唳，以為遍地草

木都是晉兵一事，<sup>32</sup>由是諷刺主帥自亂陣腳，臨陣退兵，軍隊潰敗之後，士氣一落千丈，自然無法再唱「從軍樂」提振軍容士氣。走筆至此，詞人深念漢代抗擊匈奴的名將衛青及霍去病，對照如今，國無將才、時無英雄的慨歎十分鮮明，同時也是將衛、霍名將抗擊外族的軍績拿來批擊主帥退兵的懦弱與無能。

上片主敘事，詞人面對基隆被法軍佔領的現實，同當時多數的守軍將領與臺民一樣，難以理解主帥撤兵之舉，故詞中多見諷諭之意，又同時透露出詞人對局勢前景發展極度悲觀的感情色彩。故下片轉寫景物，抒情色彩濃厚。詞人登高遠眺，往日的戰壘、空寂的營帳，在一片清冷的月光照映下更顯寂寥。「空」字意謂主帥並無收復失地之意，<sup>33</sup>在黯然神傷之際，詞人百感交集，由國難思及家難，蓋基隆失守，港口被封，詞人已無法返家，故曰「歸計未成情味惡」。惟令詞人最神傷者，不是有家難歸，而是整個國家民族即將走向沒落與衰亡，尤其耳邊響起的又是一陣陣悲涼哀怨的號角聲，彷彿是為大清帝國的沒落而吹響的一曲哀歌，神州蒼莽，夕陽西斜，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魂斷！

## 五、文化記憶與歷史評價

當代學者蔡英俊曾引漢·司馬遷對歷史纂述的意涵說解，以為：「在司馬遷的解說中，歷史的纂述活動可以推源於《春秋》、並且被置放在《春秋》相關的論述脈絡中來理解。因此，歷史的纂述活動就在於呈現政教倫理與道德原則的裁斷。」<sup>34</sup>也就是中國史傳編纂的傳統本來就是重視「褒貶善惡」、「辯是非」的歷史判斷，而非事件本身的具體描述或闡明，誠如龔鵬程所指：「（詩史）顯然含

<sup>32</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謝安傳》，卷79，頁2081。

<sup>33</sup> 據洪棄生《中西戰紀》載：「……銘傳陽許之；忽令編四百人入水返腳曹志忠營，編三百入觀音山柳泰和營——觀音山近滬尾、不近基隆，餘皆解散。是後告奮勇謀克復者，皆為沮。迄於左宗棠派提督王詩正率兵二千攻寇基隆，劉銘傳所部承意不敢開壁助戰，遂無功；卒至議和時以數千里越地易取基隆數里、澎湖一小嶼，可痛也！」見氏作：《寄鶴齋選集》，頁417。

<sup>34</sup> 詳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10年12月），頁241。（DOI：10.6466/THJCL.200912.0239）

有甚多作者的價值判斷在，既非主觀地抒情、亦非客觀地載事，而是透過作者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感情，展現歷史與時代的意義，提示歷史的評判。」<sup>95</sup>蓋《春秋》並非單純羅列史事編年，而是借事表達孔子的褒貶和微言大義，以傳達其政治理想。<sup>96</sup>所謂「詩言志」，並非詩人一己之情志，而是包含了詩人對政治、社會、時局的看法；且就功能而言，詩有教化之用，或美或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衡諸張氏詩史之作，顯然充分發揮了詩歌「諷諭」之功能，如：〈偶閱黃峴孫參軍藝蘭館詩草中有甲申乙酉兩年馬江基隆紀事詩，稽覈精詳當日戰守情形，歷歷在目，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洵統兵者之龜鑑也，意有所感，追和八首〉，通篇用典，前後各四首，分詠馬江與基隆戰事。

以上八首詩作，係以組詩形式呈現，保留了詩的密度之餘，同時增加了詩的容量，每一首詩看似寫一個事件，或評價一個人物，從而寄寓自己的歷史判斷，以達史傳諷諭褒貶之義，由是，詩人擁有更多的自由，利用組詩從不同的角度來表達意見，讀者合而觀之則能窺見歷史的全貌。以張氏詩史的寫作手法來看，詩人或在簡潔的敘事後自如地轉入議論，或夾敘夾議，或借故事人物現身說法而令其議論自見，或用典行諷諭之實，皆能把握問題的關鍵，暢快地發表意見。值得注意的是，張氏於馬尾海戰組詩對清流人士的抨擊以及基隆戰場組詩集中諷刺劉銘傳撤兵一事，不僅發為時論，更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評價。這裡涉及「集體記憶」的建構，根據倫理哲學家瑪格利特研究指出，集體記憶可區分為共同記憶和分享記憶，共同記憶是就語境而言，指所有的個體要記住的是同一件事，而這些個體都是這件事情的親歷者或目擊人，被聚合的記憶就會成為共同記憶，亦即社群中絕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分享記憶則是就交流而言，也就是在聚合個體記憶之外，還要對那些散的個體記憶進行「校準」或「修正」，使之從一種個體的言說上升為公共空間裡可供開放性交流和自由討論的話題。<sup>97</sup>從這個層面來說，分享記憶關

<sup>95</sup>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6。

<sup>96</sup> 張毅：〈論「春秋」筆法〉，《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2001年7月），頁49-55。

<sup>97</sup> （以）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著，賀海仁譯：《記憶的倫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1-52。

注的是記憶的公共性及其作為一種公共政治或公共生活議題的普世性，而不是記憶的私人化或獨特性。由是觀之，張氏馬尾海戰與基隆戰事詩史之作似乎正扮演著「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分享記憶」的功能。

在文化記憶的理論中，認為「就關愛的關係而言，記憶不只是『知道』，而且是『感受』」，<sup>88</sup>「感受」建立在「知道」的基礎上，借助語言「再現」歷史，並對歷史做出判斷，其中面對戰爭的創傷記憶，必然對個體心靈帶來巨大的影響。所謂「創傷記憶」，依心理學的角度係「指對生活中具有嚴重傷害性事件的記憶」，可能指身體、心理或是精神的傷害，從而引發個體在認知、情感以及價值判斷方面的相對反應，並對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sup>89</sup>「創傷記憶」的特徵，必定是一種情緒或情感記憶，即「當某種情境或事件引起個人強烈或深刻的情緒、情感體驗時，對情境、事件的感知和記憶。這類記憶的回憶過程中，只要有關的表象浮現，相應的情緒、情感就會出現。情緒記憶具有鮮明、生動、深刻、情境性等特點」。<sup>90</sup>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回頭檢視張氏同樣詠馬江一役與基隆戰事的「詞史」作品，於書寫策略及文體功能顯然相較於詩史更適宜作為創傷記憶的文化表徵。亦即詞作相較於詩歌，雖同樣譏刺了戰略失策，臨陣脫逃的將軍張佩綸與擅自從基隆戰場撤兵的主帥劉銘傳，但敘事上更含蓄委婉，少有細節的描寫和對歷史成因的評價討論，反而更集中書寫了作者的內在心境與感懷，體現情景交融的抒情傳統。

蓋中國詩學向有「言志」與「緣情」兩大傳統：「言志」不但指言個人之意志，亦多涉及個人對政治、社會和時局的批評；「緣情」發於陸機〈文賦〉，相對於「言志」，強調個人的感情亦有書寫的價值。在傳統詩學中，「言志」的影響更勝於「緣情」，如「詩史」的概念即強調詩的社會功能。<sup>91</sup>至於詞，原本沒有「言志」的需要，周濟提出詞應寫「由衷之言」，把詞人與外界（社會）互動後

<sup>88</sup> 徐貴：《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年），頁3。

<sup>89</sup> 楊治良等編著：《記憶心理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12。

<sup>90</sup> 同前註，頁416。

<sup>91</sup> 參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頁1-46。

的情感用比興手法寫出，由是，詞作結合了時代與個人印記，亦具有普遍的意義，成功把「言志」和「緣情」融合起來。<sup>92</sup>根據上引作品可知，張氏詞史雖不如詩史諷諭褒貶的力度與廣度，但其所抒之情放入特定的歷史脈絡，反而更能彰顯作者的真情深意，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化表徵，誠如趙靜蓉所言：

創傷記憶的真正意義，不是重述人類個體或集體經驗過的痛苦或傷害，即不是創傷經歷本身，而是這一事件對於整個社會和文化結構性的「鬆動與震撼」，以及由此提供給人類的「震撼與恐懼」是如何被人類克服並有可能最終拯救人類。<sup>93</sup>

由於創傷本身就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過去」或「不會消失的過去」，它「使時間和經驗之間的順序變得無效了」，<sup>94</sup>是以創傷時刻影響著親歷者的現實生活，而親歷創傷的倖存者所持的更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記憶視角。此可舉張氏〈酌江月·法夷既據基隆，擅設海禁。初冬，余自新竹舊港內渡，遇敵艘巡邏者駛及之，幾為所困。暴風陡作，去帆如馬，始免於難。中夜抵福清之觀音澳止，宿茅舍，感賦〉一詞為例，蓋詞人以其親身經歷書寫苦難的過程，「在苦難面前，沒有什麼比苦難本身更具說服力。這大概是親歷者在創傷記憶的言說中獨具權威性的重要原因」。<sup>95</sup>

德國哲學家阿爾多諾（Adorno）在《否定的辯證法》書中對個體擔當與人類創傷之間的關係問題曾有過這樣的表述：「日復一日的痛苦有權利表達出來，就像一個遭受酷刑的人有權利尖叫一樣。因此，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你不能再寫詩了，這也許是錯誤的。但提出一個不怎麼文雅的問題卻不為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你能否繼續生活，特別是那種偶然地倖免於難的人、那種依法應被處

<sup>92</sup> 參徐璋：《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95。

<sup>93</sup>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頁106。

<sup>94</sup> （德）阿萊達·阿斯曼：〈記憶作為文化學的核心概念〉，收於（德）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123-124。

<sup>95</sup>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頁99。

死的人能否繼續生活？」<sup>96</sup>依其說，「寫詩」是一種個體的言說，是把私密化、不可見的個人記憶和經驗轉換為話語表述，使之得以呈現，並且能夠被分享或分擔，因為人類必須表達、交流和討論，無論在文學的還是歷史的層面上。當我們面對歷史的和文化的創傷，這些個體的記憶無疑具有重要的修復作用，以張景祁詩史與詞史為例，作者將眾多的歷史細節篩選、過濾，通過反覆敘述來修正自身所受到的傷害，同時形成集體的共識，最終達到建構歷史意識與修復文化創傷之目的，自有其深刻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

## 六、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張景祁於中法戰爭期間書寫馬尾海戰與臺灣戰事詩史、詞史之作品深入解析，同時結合文化記憶的理論與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可得出以下結論：

- (一) 「詩史」作品係通過歷史評價聚合個體記憶，同時進行「校準」或「修正」，使之從一種個體的言說上升為公共空間裡可供開放性交流和自由討論的話題。如有關晚清清流派的歷史評價，及至現今仍為史學家所關注。<sup>97</sup>
- (二) 「詞史」作品傾向創傷記憶的書寫，通過回憶的過程，抒發個體相應的情緒，表達「由衷之言」。如張氏以詞書寫親歷國難的哀傷，同時表達對主帥劉銘傳擅自撤軍以及國家局勢的由衷之言。
- (三) 親歷創傷的倖存者往往具有非同尋常的記憶視角，張氏親歷法軍侵臺戰事，可為印證並回應此種觀點。

值得一述者，本文經由詩詞互證的研究進路，使得作品的詮釋更加豐富且具體，如〈秋霽·基隆秋感〉一詞，歷來未有詞評家明確指出「燕巢自驚危暮。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三句係嘲諷主帥基隆撤兵的錯誤決策，惟參照詩史鮮

<sup>96</sup> (德)阿爾多諾著，張峰譯：《否定的辯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頁363。

<sup>97</sup> 詳徐中約對清流黨集團之評價。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34-336。

明的批評立場，適足以擴充詞史的抒情功能與歷史評價。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注：《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清)王韜：《弢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清)李慈銘：《越縵堂詹詹錄》(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本)。
- (清)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清)張景祁：《新蘅詞》(清光緒十三年(1887)百億梅花仙館本)。

### 二、近人論著

#### (一)專書

-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尤振中、尤以丁編著：《清詞紀事會評》(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
-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擘雅堂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 85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
- 阿英編輯：《中法戰爭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 李守孔：《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2 年）。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
- 李其霖主持：《清法戰爭滬尾之役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新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2019 年）。
-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臺北：臺灣銀行，1972 年）。
- 俞天舒原編，潘德寶增訂：《黃體芳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
- 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8 年）。
- 徐瑋：《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香港：中華書局，2018 年）。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通史社，1924 年）。
- 盛清沂、金惠編纂：《臺北縣志》（新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1960 年）。
- 郭廷禮：《中國近代文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 張連忠：《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年）。
- 張子文、郭啓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
- 黃振南：《中法戰爭諸役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陳悅：《中法海戰》（北京：台海出版社，2018 年）。
- 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臺北市志》（臺北：臺北市政府，1988 年）。
- 楊家駱主編：《歷代詩史長編》（臺北：鼎文書局，1971 年）。
- 楊治良等編著：《記憶心理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法軍侵臺檔》（臺北：臺灣銀行，1964 年）。
-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 年）。



- 廖宗麟：《中法戰爭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趙靜蓉：《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龍章：《越南與中法戰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臧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歷史科教學研討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2008年）。
-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出版社，1993年）。
-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 （以）阿維夏伊·瑪格利特著，賀海仁譯：《記憶的倫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法）格榮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
- （德）阿爾多諾著，張峰譯：《否定的辯證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
- （德）阿斯特莉特·埃爾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二) 期刊論文
- 安寧：〈血與火寫出了中法馬江海戰〉，《炎黃縱橫》第8期（2014年），頁23-26。
- 艾克：〈海權視角下馬江海戰致敗因素分析及其現實啓示〉，《學術界》第10期（2014年），頁43-56。（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4.10.004）
- 李恩涵：〈左宗棠與清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1994年6月），頁207-237。
- 李恩涵：〈同治、光緒年間（一八七〇—一八八五）湘、淮軍的衝突與合作〉，《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頁321-346。（DOI：10.6353/BIMHAS.198007.0321）
- 呂實強：〈綜論劉銘傳的歷史功績〉，《歷史月刊》第96期（1996年1月），頁26-31。
- 張毅：〈論「春秋」筆法〉，《文藝理論研究》第4期（2001年7月），頁49-55。

陸胤：〈「清流」浮沉與近代學風——以張之洞學人圈的形成為例（上）〉，《國學學刊》第3期（2012年），頁132-141。

郭秋顯：〈錢琦、張景祁生卒年暨宦臺史事考釋〉，《明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5期（2017年12月），頁83-98。（DOI：10.6517/MCUT.201712\_(5).0005）

廖宗麟：〈鎮南關大捷雜考〉，《近代史研究》第2期（1993年），頁264-269。

趙慧峰：〈晚清清流與同光政局〉，《烟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6年），頁41-46。

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10年12月），頁239-271。（DOI：10.6466/THJCL.200912.0239）

蘇淑芬：〈清領時期游宦人士張景祁筆下的臺灣——以張景祁臺灣詩詞為例〉，《輔仁國文學報》第29期（2009年10月），頁211-238。

### (三) 論文集論文

陳邦炎：〈笛吹鯤洋，蒼涼詞史——論新蘅詞〉，收於《詞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籌備處，1996），頁201-219。

### (四) 學位論文

余衛星：《張景祁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6月）。

### (五) 報紙文章

不著撰人：〈廈門魚箋〉，《申報》，1884年8月12日。

不著撰人：〈臺北軍電〉，《申報》，1884年10月10日。

### (六) 電子資源

「馬江之役」條目，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B1%9F%E4%B9%8B%E5%BD%B9>）（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6月30日。）

「西仔反」條目，引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B%94%E5%8F%8D>）（上網檢索日期：2021年6月30日。）

# Memory Writing of the Sino-French War in Foochow and Taiwan: A Study of Zhang Jingqi as a Poet- and Ci-Historian

*Wang, Hsiao-We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Sino-French War in Foochow and Taiwan is taken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tudy to explore the emergent “historical poetry” and “historical Ci,” which document and evaluate the history of a war, in this era of having unres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mbin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literary writing, cultural memory and New Historicism are us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our investigation to seek more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s and richer implications of the works of “historical poetry” and “historical Ci.”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depth analyses of Zhang Jingqi’s specific wor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s works were regarded as “historical poetry” and “historical Ci” because of the documents of the Battle of Foochow in the Sino-French War and the chronicles of Taiwan. Therefore, his works illustrate a good example of such studies. Through the current study, it is hoped that for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Sino-French War, a possible conscious cultural activity can be found. That is, through Zhang Jingqi’s narrative perspectives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s in his “historical poetry” and “historical Ci,” those distant historical scenes can be restored to unveil disappearing events to the world,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hidden in them can be discovered.

**Keywords:** the Sino-French War, Zhang Jingqi, Historical Poetry, Historical Ci, Cultural Memory